

资 料 选 编

第 6 辑

云南民族学院教改组翻印

一九七四年四月

目 录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1)
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11)
读柳宗元《封建论》	(24)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37)
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	(51)
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67)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 是什么？

辽宁大学 李 时

秦始皇是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尊法反儒，厚今薄古，坚持革新，反对倒退，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促进统一的进步作用。但两千多年以来，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尊孔派，都竭力抹煞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叛徒、卖国贼林彪同样用孔孟之道肆意歪曲历史。他借咒骂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关于秦始皇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不仅是史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奴隶们反抗奴隶主贵族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在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复较量过程中，地主阶级专政逐步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进一步统一中国成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秦始皇统一六国，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

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就秦王朝本身来说，起决定作用的

究竟是什么？是由于个别将领的能征善战呢，还是由于有一条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如果把秦统一六国的功绩都归于秦将王翦、王贲父子，认为与秦始皇无关，或以此来贬低秦始皇，那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否定了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需根据客观的事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秦统一六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战国时期，封建制正在代替奴隶制。反对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篡权复辟，铲除封建割据的诸侯王国，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自秦孝公至秦始皇，秦坚持了一条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适应了历史的发展。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建立起各项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等政策，“劝民耕农利土”，“习战陈之事”^①，“外连衡而斗诸侯”（“对外实行‘连横’政策而使诸侯各国自相争斗”）^②。从此，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了政权，经济力量迅速增长，军力日益强大，“秦之锐士”远远胜过“齐之技击”、“魏氏之武卒”^③，并且“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宰割天下”^④。到秦始皇时，秦国经历了六世，一百余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东方六国占着绝对的优势，由原来落后、贫弱的地位，一跃而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先进、最富强的诸侯国，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有利条件。当时“三晋”（韩、赵、魏）的很多劳动人民都跑到秦，从事生产和当兵；东方六国的一些新兴地主阶级人士如

李斯、尉繚等纷纷投奔到秦，做“客卿”，为秦谋划统一。这都说明当时的人心向着先进的秦国，希望由它完成统一。但在秦始皇即位初年，相国吕不韦掀起复辟逆流。他继承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思想，主张分封诸侯，妄图复辟奴隶制，并把早已灭掉的卫国重新恢复起来。这是对历史的反动。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三八年亲政之后，打倒了吕不韦、嫪毐反动集团，是一次法家改革路线的重大胜利，这就为统一六国扫清了道路。

与此同时，六个诸侯国虽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转化，但由于没有坚持或彻底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路线，因而谁也没有力量起来统一中国。楚国幅员最大，人口最多，兵数最众，公元前三八一年吴起变法失败之后，掌握军政大权的始终是昭、景、屈等大贵族，“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⑤，统治者倒行逆施，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赵国在武灵王时期，改革军制，“胡服骑射”⑥，兵力比较强大，而政治、经济却没有相应改革，赵氏宗族专政，“上下不相亲”、“贵贱不相信”⑦，各种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怨声载道。魏国在战国初期，因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⑧，虽曾盛极一时，但过了不久，旧贵族势力抬头，“平余法”等政策不能继续贯彻下去，国力就逐渐衰退了。齐国，地主阶级掌权虽早，也有过一些改革，但是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田氏宗族势力也很大，以致未能使改革进行到底。韩国的改革也不彻底，象著名法家韩非的政治主张并没有被实行。至于燕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改革。这些诸侯国旧贵族势力专权比较普遍，楚春申君、赵

平原君、魏信陵君、齐孟尝君等贵族奴隶主代表人物“方争下士，招至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⑨。由于这些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不象秦国那样蒸蒸日上，加上他们只顾各自的利害，不可能真正实现什么“合纵”，在互相攻伐中又大大削弱了国力，最后只能被秦所消灭。

由此可见，战国七雄对峙的时候，秦国由弱变强，并不是偶然的。正如荀子所说：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⑩。就是说，这不是什么碰运气的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其它六国由强变弱，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历史根由的。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⑪，六国“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⑫，终于导致了秦的胜利，六国灭亡。这个历史事实充分说明，秦统一六国，不能孤立地归结为个别将领的作用，而是由于秦始皇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他所实行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起了决定作用。

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这就告诉我们：自古以来，军事路线同政治路线总是紧密相联的。政治路线决定了军事路线，军事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军事路线是为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并为后者服务的。

秦始皇根据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采纳了著名法家李斯、尉繚的建议，制定了统一六国的战略部署。首先，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派姚贾等人出使并粉碎了六国诸侯的

“合纵”政策^⑬；接着“乃使其良将随其后”^⑭，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攻打六国。他的作战部署是，从取韩开始，再南北出击，破赵、燕，灭魏、楚，横扫两翼，然后歼灭齐国。攻“三晋”和燕、楚时，使人劝齐王放弃“合纵”政策，“不助五国攻秦”^⑮。秦始皇这一作战部署，贯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韩、魏是“天下之枢”^⑯，“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堵塞着秦国的要道，而掩护着华山以东的其他几个诸侯国”）^⑰。特别是韩，乃秦的“心腹之病”^⑱。如果燕、齐、楚、赵等国联合起来支持韩、魏反秦，“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⑲。鉴于这个形势，秦国自孝公以来，多次用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商鞅用于秦，而收魏”，“范雎用于秦，而收韩”^⑳。这样，秦国能够粉碎六国“合纵”的战略，利用敌方矛盾，各个击破，得寸有寸，得尺有尺。秦始皇根据新的形势，继承了早就行之有效的这个“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进军神速，自公元前二三〇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结束，十年之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㉑。

六国诸侯面对秦国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他们除调动所有军队进行顽抗之外，还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作垂死挣扎。燕太子丹妄想颠覆秦国，重振诸侯，秘密派了亡命徒荆轲窜到秦国去谋刺秦王。齐王建派人到秦国，妄图离间秦国君臣，进而瓦解秦国。这种搞暗杀、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是没落阶级的阶级本性及其反动政治路线的必然表现。结果，他们都没有得逞。燕太子丹导演了“荆轲刺秦王”这种孤注

一掷的阴谋暗杀，既挽救不了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灭亡，也阻止不了新兴地主阶级走历史的必由之路，而且只能以荆轲“一去兮不复返”而告终^②。去到秦国的齐客，反过来为秦国服务，“劝（齐）王朝秦”^③，加速了齐国灭亡。这些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人物，战场上一败涂地，阴谋诡计又遭败露，终究免不了一朝覆没。

秦始皇非常重视统一六国的战争，亲自部署和领导了这场战争。他在关键时刻，于公元前二三四年“之河南”，公元前二二八年“之邯郸”，公元前二二四年“游至郢、陈”^④，三次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促进了战争的胜利。同时，又在军事胜利的过程中，为了巩固战果，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措施，即把灭掉的诸侯国改设为郡县，把新占领区内的奴隶主贵族和大商人迁徙到容易控制的地方或边远地区，扩大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秦始皇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⑤，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是他的军事路线的胜利，更重要的也是他的政治路线的胜利。

王翦、王贲父子等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打了几个胜仗，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战略指挥的正确。当秦楚之战，李信等人带领二十万秦军首战告捷，随后遭到楚军袭击而挫败时，秦始皇派王翦带六十万大军继续击楚，楚用全部兵力抵抗秦军。当时的战略形势是：秦已取得灭韩、魏的胜利，无后顾之忧，兵强马壮，秦始皇敢于集中兵力，以逸待劳；而楚军则以劳对逸，陷入困境，难以持久，“乃引而东”。于是王翦挥军追击，“大破荆（楚）军”^⑥。当然，王翦个人在这一战役中，是有作用的，但他这个作用也只有秦始皇

统一六国的正确战略指挥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试想：没有“远交近攻”的战略，没有秦始皇的统筹全局，没有秦军早已取得灭韩、魏，破赵、燕的胜利，王翦个人能在这一战役中取胜吗？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王翦以逸待劳的战术能行得通吗？没有秦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巩固的地主阶级专政，王翦一人能打败强敌吗？一句话，没有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单凭王氏父子那样几名将领能打出统一的天下吗？不能，“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离开了秦始皇的法家改革路线来谈论王氏父子的战功，就是离开了政治来谈论战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政治路线的正确，决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最终必胜。但以王翦个人来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他领兵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公元前二二九年，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②7}当时王翦受挫，一年内没有多大进展。后来，由于秦始皇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一方面从内部分化瓦解敌方，一方面大举进军，猛烈攻击，才取得了平赵战争的胜利。

然而，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公元前二二六年，王翦攻下燕都蓟城之后，便“谢病老归”^{②8}。公元前二二四年，秦始皇为了灭掉实力比较强大的楚国，“复召王翦”，要他带六十万大军击楚。王翦开始推辞不干，勉强答应后，又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始皇好言抚慰他，他却不听，对秦始皇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

孙业耳。”大军已经出发，他还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王翦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当时就有人不满地对他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②9}秦始皇并没有迁就王翦这种刚负重任就多“请田宅”的无理要求，只付之一笑^{③0}。他既坚持了法家的“论功行赏”的原则，又没有使王翦失去立功的机会，继续信用他。所谓“翦为宿将，始皇师之”^{③1}，就反映出秦始皇起用已经退出战场的老将，发挥他的作用，有其任人唯贤的政治原则。

其实，在战国时期要论名将，王翦父子还不能名列前茅。如廉颇就是战国时期少有的名将，他曾屡次打败过齐军，两度攻拔过魏地，也曾大破燕军取得五城，还在长平抵御过秦军，“以勇气闻于诸侯”^{③2}。可是，为什么廉颇不能象王翦父子那样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功呢？归根结底，是因为赵国的政治路线不正确，社会改革不彻底，赵王任人唯亲，旧贵族逆历史趋势而动，没有秦国那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条件，廉颇也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再如李牧，曾与廉颇齐名，同为赵国名将，有谋有勇。他曾“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③3}。就能征善战而言，王翦与李牧相比，无论军事谋略，还是勇猛冲杀，都差一筹。李牧在赵国虽有战功却未能善终，最后因赵王受人挑拨而被杀掉了；而王翦在秦国则能为统一六国而战，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这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明：在阶级斗争中个人是受一定的政治路线支配的。政治路线对了，将领的作用可以得到发挥；政治路线错了，将领还能发挥啥作用？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还会垮台！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社会变革，归根到底，就是新兴的阶级战胜没落的阶级。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就是新兴地主阶级战胜旧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史，也是改革彻底的国家战胜改革不彻底的国家的历史。秦之所以能消灭六国，实现统一，并不是由于王翦父子起了决定作用，而是由于秦始皇所代表的坚持革新、坚持统一、坚持进步的政治路线战胜了主张倒退、主张分裂、主张复辟的反动路线。这里，如果把将领个人看做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那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实现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正确的革命路线起决定作用。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是在革命实践中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反复证实了的真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叛徒、卖国贼林彪，顽固地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鼓吹英雄创造历史，把党和人民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的丰功伟绩窃为己有，就是妄图改变党的路线，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篡党夺权，

投靠苏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开历史倒车，结果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当前，在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彻底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注：

- ①⑬⑮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 ②④⑪ 贾谊：《过秦论》
- ③⑩ 《荀子·议兵》
- ⑤ 《战国策·楚策三》
- ⑥ 《史记·赵世家》
- ⑦ 《战国策·秦策一》
- ⑧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 ⑨ 《史记·春申君列传》
- ⑫⑲ 苏洵：《嘉佑集》卷三《六国》
- ⑬ 《战国策·秦策五》
- ⑭ 《史记·李斯列传》
- ⑮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⑰⑳ 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一《六国论》
- ㉑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 ㉒ 《史记·刺客列传》
- ㉓ 《战国策·齐策六》
- ㉔㉕㉖ 《史记·秦始皇本纪》
- ㉗㉘㉙㉚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 ㉛ 《战国策·赵策四》
- ㉜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 ㉝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秦始皇是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勇于革新，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在我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两千多年来，不少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仅竭力抹煞秦始皇的历史功绩，甚至疯狂咒骂秦始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也歪曲历史，借攻击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围绕着秦始皇问题的争论，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归根到底表现着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和斗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对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价，对于批判反动的历史唯心论，深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一步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秦始皇所处的历史时代

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转变的时代，是进一步摧毁奴隶制残余，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和发展

封建制度的时代。统一的趋势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诸侯割据的局面则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易于保存奴隶制残余。

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发生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中期，在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封建地主阶级在各国相继夺取或部分夺取政权，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初步发展。在农业方面，奴隶制的井田制逐渐破坏，许多农业劳动者由奴隶的地位解放为农奴或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被广泛采用，许多荒野和森林辟为农田。工商业方面，奴隶主贵族的垄断已逐步被打破，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有较大的发展。一些大商人“结驷连骑”，往来于各国之间，城市增多，规模扩大，农村也有了定期的集市。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子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反映了当时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向。

可是，诸侯割据的藩篱，阻碍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和度量衡，差异很大；他们又互相防范，设置了许多路障、关卡，苛查勒索来往行人，限制了商品的流通。甚至用河水互相浸淹，摧毁了城市，破坏了农业生产。各国连年混战，赋税徭役加重，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有的被迫“嫁妻卖子”，重新沦为奴隶。

很明显，不结束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不实现统一，不进一步扫除奴隶制残余，新兴的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学派提出“法后王”和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主张，反映了时代

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毛主席指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改革不适应封建经济基础发展的政治和文化等等上层建筑，这就是当时所要解决的主要历史任务。由谁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呢？关东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些国家的改革不彻底，奴隶制残余很多，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政治腐败，国力虚弱。而秦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商鞅主持了秦国的变法，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发展了地主经济；又实行“奖励耕战”政策，国家逐渐强盛起来。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例如法家韩非、李斯等都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六国的人民不满本国的统治，向往统一。韩、赵、魏的人民成批地逃向秦国。这种情况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到战国后期，由秦统一中国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秦始皇所进行的重大改革

公元前二四七年，秦始皇十三岁即王位，二十二岁开始亲自掌握政权。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为完成和巩固统一中国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

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首先，秦始皇清除了吕不韦、嫪毐复辟集团，重用法家，胜利地领导了统一中国的战争。

秦始皇初即王位时，秦国处在政治上的逆转时期。这个逆转主要是由于吕不韦和嫪毐（音烙矮）垄断了秦国的大权，大搞奴隶制复辟引起的。

吕不韦原是卫国的大商人、大奴隶主，因搞政治投机充当了秦王子楚的丞相。秦始皇即位后，他又以丞相身份独揽大权，被封为文信侯，尊为仲父。吕不韦有奴隶一万多人，食邑十万户，是当时少有的大奴隶主。他招募儒生、术士三千多人，并授意一些人为他著《吕氏春秋》一书，攻击主张社会变革、维护新兴封建制度的法家思想，宣传继续分封诸侯，保持奴隶主贵族割据统治的制度。吕不韦说过“乱莫大于无天子”，有的人认为吕不韦也反对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主张全国统一，实际上吕不韦的统一概念和儒家的所谓“统一”，即“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左传》昭公七年）一样，也就是复辟奴隶制度下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样的“统一”只能是统一于倒退，统一于反动。由吕不韦一手扶植的宦官嫪毐有奴隶数千人，食客千余人，被封为长信侯，以河西、太原二郡为封国，也是一个大奴隶主。吕、嫪互相勾结，又纠合了一小撮反动官僚，在太后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阴谋复辟的政治集团。

青年时代的秦始皇就是一位崇尚法家的政治实践家，这对吕、嫪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威胁。秦始皇开始亲政，嫪毐立即发动了武装政变，妄图杀害秦始皇，篡夺王位。秦始皇坚

决镇压了这次政变，处决了嫪毐等人，软禁了太后。第二年又查办吕不韦，吕畏罪自杀，吕、嫪复辟集团被清除。

这时，宗室大臣等保守势力又发起了一个驱逐在秦任职的关东人的“逐客”运动，妄图赶走法家李斯（楚国人）等。李斯是荀子的学生，他建议秦始皇“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在有利于统一事业的前提下用人。秦始皇接受了这个建议，取消“逐客令”，以李斯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以魏国人嫪为国尉（最高军事长官），组成了一个以法家为主的新的领导核心。

秦始皇镇压吕、嫪复辟集团和保护、重用李斯等人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是富有革新精神的法家政治路线和保守、反动的儒家政治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内部的奴隶制残余势力，制止了秦在政治上的逆转，并为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建立了强有力的指挥部，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稍后，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始皇之手。韩非也是荀子的学生，他的学说集战国法家理论的大成，认为应该根据时代和情况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政策（“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提出“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对这一学说十分赞赏，说：“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的学说为他进行统一战争以及后来的各种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秦始皇在作好了统一战争的准备之后，用了十年时间（公元前二三〇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